

再现荒诞哲理的杰作

黄新成

(四川外语学院 法语系,重庆 400031)

摘要:本文具体论述了安德烈·马尔罗的《征服者》和《人的状况》的创作动机不在于描写中国革命,而在于以其精心选择的
中国革命为小说背景,成功地再现荒诞哲理,即马尔罗哲理。

关键词:马尔罗;荒诞哲理;荒诞性;人生价值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5)01-0051-05

The Masterpiece to Reappear the Philosophic Theory of Absurdity

HUANG Xin-Cheng

(Department of French,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China)

Abstract: The creative motivation of Andre Malraux's conquerors and condition of human is not to describe China's revolution, but lies in choosing regarding revolution of China as the background of the novel and succeeding in reappearing the philosophic theory absurdity, namely Andre Malraux's philosophic theory.

Key words: philosophic theory of absurdity; absurdity; value of life

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 1901 - 1976)是受现代主义文学影响的现实主义作家,是西方文坛上与中国革命结下不解之缘的一位传奇式人物。有人
认为他的《征服者》(1928)和《人的状况》(1933)的创作动机是描写中国革命,但实际上,以中国革命为题材,反映中国革命仅仅是马尔罗的表面动机,而其真实意图却在于以中国革命为小说背景,去再现其荒诞哲理。1949年,即《征服者》问世21年后,马尔罗在为《征服者》的再版所写的《后记》中写到:“但此书仅仅表面上属于历史类,它之所以流传至今,并不在于它刻画了中国革命的某些插曲,而在于它展现了一个集行动能力、文化修养、思想意识于一身的英雄典型。这些价值与当时欧洲的这一类价值是间接相联系的。”^[1]马尔罗还说过:“现代小说是最适宜于表现人的悲剧性的形式。”马尔罗所谓的人的悲剧性,即人生存的荒诞性。这就道明了他写《征服者》和《人的状况》的真实动机。

为弄清马尔罗如何在《征服者》和《人的状况》中成功地再现其荒诞哲理,首先得明白什么是荒诞。

通常,所谓荒诞,即不真实,即部分地或完全不遵守一般习俗。“但在西方现代派作家笔下,荒诞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荒唐或离奇,而是指人赖以生存的社会的不合理,以及人与社会环境的不协调和冲突。”^[2]法国著名作家罗伯·格里耶曾指出:“阿尔贝·加缪

以‘荒诞’一词去称呼人与世界之间的深渊、人类的精神渴望和世界上实现这些渴望的可能性之间的距离。”^[2]“可见,荒诞的实质是意识到人与世界的脱离和对立,在不合理的客观世界里,人的主观理性无能为力,人的希望得不到实现,努力也是枉然的。”^[2]

当然,人生存的荒诞性并非马尔罗的首创,但马尔罗是最早接受17世纪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关于人类状况的悲观哲学的作家。他曾先后多次在《西方的诱惑》、《征服者》、《王家大道》、《希望》、《人的状况》、《阿尔滕堡的胡桃树》等作品中引用或阐述过帕斯卡尔的这样一段名言:“请设想一下,戴着锁链的一大群人,他们每个人都判了死刑,每天,其中一些人眼看着另一些人被处死,留下来的人从他们同类的命运中看到了自己的命运,痛苦而绝望地互相对视着……这就是人的状况的图景。”^[3]因此可以说,帕斯卡尔的这一思想几乎贯穿在马尔罗的所有作品中,但小说《征服者》和《人的状况》是对这一描述所作的最成功的阐述、充实、发挥和升华。

马尔罗荒诞哲理的核心论点是人生存的荒诞性;面对荒诞的人生,人经受着痛苦、孤独、忧虑、恐惧的煎熬;人具有对抗和摆脱荒诞性的本能;对抗、否定和战胜荒诞性的最好途径是行动。下面,我们具体阐述马尔罗在《征服者》和《人的状况》中是怎样再现其荒诞哲理的。

《征服者》取材于1925年北伐战争前夕爆发的省港大罢工,小说围绕这一著名事件,展现了广州革命政府中各种政治力量的矛盾和斗争,尤其是革命力量与帝国主义支持的地方军阀之间的较量,反映了这场大罢工的全过程:罢工的酝酿和爆发、罢工受到国民党右翼势力的阻挠、广州政府下令抵制英国洋货、第三国际代表和中国共产党人在广州政府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地方军阀陈炯明的反扑、无政府主义者的恐怖活动,等等。

尽管如此,描写这场斗争并不是马尔罗的创作目的。首先,我们可以说,作者根本就不在乎反映这场斗争不可忽视的中国革命者的塑造。在他看来,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并不重要,因此,他把中国革命者刻画成一群充满荒诞意识的西方式革命人物,结果在这些人物身上,中国共产党人的品德情操荡然无存。中国读者之所以会产生一种印象,即以作为革命者来刻画的小说主人公皮埃尔·加林为首的革命者们,同省港大罢工中真正的中国革命者的形象相去甚远,这就不足为怪了。加林1892年出生在瑞士,父亲是瑞士人、母亲是俄罗斯人,能讲德、法、俄、英四种语言,深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1918年被第三国际派来中国,作孙中山的法律顾问,负责宣传工作。在马尔罗的笔下,加林完全不像中国革命者那样有明确的革命动机和革命目标,诸如参加大罢工和革命斗争是为了推翻地方军阀的统治,推翻当时中国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等等。他曾因资助堕胎行为而吃了官司,被判处6个月牢狱(缓期执行)。他不愿接受这种由于怪诞原因而冤判坐牢的事实。他在信中写到:“这是荒诞的。我决不想说这是不合理的。改变这个社会,我对此不感兴趣。”^[1](p257)不过他“否认社会是坏的,是不能够改善的”。“他并不是反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决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它是诱导工人激情的方法,是在工人中征集突击队的方式。”^[1](p257)

其次,马尔罗塑造加林这个人物的动机是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思想意识分不开的。尼采说:“上帝已经死亡。”这就导致了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洗礼的西方人宗教信仰的幻灭,让荒诞意识乘虚而入,渗透入人类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各个角落。西方人对整个社会的荒诞性的认识“已成为一种普遍的、自觉的群体意识,一种广泛的社会精神现象”,人们越觉得社会的荒诞,就越感受到人生存的荒诞,就越为自身命运而悲哀。

马尔罗一心想通过其主人公来表现的正是20世纪西方人的病态心理,这是种缺乏沟通,陷入被荒诞感深深困扰的孤独和痛苦之中的状况。马尔罗了解并亲眼目睹过中国和一些跟当时的中国一样贫穷的亚洲国家的人民的生活状况,这种极富代表性的生存状况激起了他对人类生存的荒诞性和无法摆脱的命运的痛苦深思,结果选择了中国革命氛围作为再现其荒诞哲理的背景。在马尔罗看来,命运是人类难以逃避、难以改变、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人类要采取行动去反抗这不可避免的命运,那么,这些行动

本身也是荒诞的。人们越感觉自己行动的荒诞,就越为自身命运的可悲而深感痛苦、孤独。这就是《征服者》中以加林为代表的革命者为什么没有中国革命者的情操的缘故。因为他们总是忍受着一种精神上的深刻危机的困扰,人类屈辱的生存状况始终使他们深刻地感受到人类和社会的荒诞。加林说:“我见过许多人在受痛苦,有时卑鄙地受痛苦,有时可怕地受痛苦……痛苦使人生更加荒诞。”^[1](p266)加林还认为:“在我的一生中,有一定的节奏,一种我逃避不了的个人归宿,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我明白生命毫无价值,但什么也不如生命有价值。”^[1](p258)马尔罗的人物之所以参加罢工、进行革命、甚至付出生命,正是为了反抗人类生存的荒诞性,为了寻找人类生存的意义,为了恢复人的尊严。因此,对于他们,参加革命这一举动本身的价值大大超过了革命本身具有的价值。实际上加林除了知道参加罢工和革命斗争时,能忘记萦绕在心里的荒诞感觉外,全然不知道革命有何别的价值。正如他说:“我一生作了什么呢?”“我所领导的这些人……我甚至不知道他们明天会干什么……”^[1](p239)

关于加林参加罢工的动机,连马尔罗本人也认为,对加林来说,他根本不需要了解为什么会参加,只需要了解自己如何才能逃避人生最具有悲剧性的东西——荒诞,如何改变这不可避免的可悲命运。“他不知道什么是革命,但他一旦有了这样或那样的决定就知道了去向何处。”^[4]因而,“对于加林,基本问题不是要知道怎样参加革命,而是要知道怎样才能摆脱他称之为荒诞的东西……”因为加林把一切与人类生存相悖的各种社会问题都归于荒诞,甚至认为整个社会都是荒诞的,并且认识到人类“被荒诞的力量所驱使”,这种荒诞是人生面对的最具有悲剧性的东西。他说:“社会秩序给我关于荒诞性的印象,逐渐扩展到差不多与人有关的一切事物……”,“人可以在生活中接受荒诞,但不能生活在荒诞中。”^[1](p266)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加林为什么在自己房间里同时与两个中国妓女睡觉,并说“要平静地处理严肃的事情,最好同她们睡觉,而且别再去思考”^[1](p170)。

由此可见,马尔罗把加林投身革命界定为“同人类的荒诞性作斗争”,是一种逃避荒诞的举动。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加林参与大罢工一类的“伟大行动”,并不指望要达到什么政治目的或什么崇高理想,而仅仅是把它当作一种手段,一种精神寄托,一种排解痛苦、消除空虚的行为而已,他知道它充其量能给他带来一种新的存在和尊严的意识,为他提供一种逃避生存的荒诞、逃避可悲生存状况的工具。从加林在小说中的表现,与其说他是个革命者,不如说他是马尔罗荒诞哲理的传声筒和代言人。

再次,在马尔罗笔下,死亡同行动一样,是同人生的荒诞性作斗争的另一种手段,不过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手段,一种彻底解脱的手段,一种一劳永逸地逃避荒诞和孤独的下策。人临死前会感到极其孤独、痛苦、失望,会产生重新受生存荒诞性困扰的绝望感。加林生病后说道:“奇怪,吃官司后,我当时强烈地感

受到人生的虚荣感、受荒诞力量摆布的人道主义。现在,我又有这种感觉……这愚蠢的病……然而,我觉得我在这儿所干的是在同人类的荒诞作斗争……荒诞又找到了它的权力……”^[1](p195)对以加林为首的西方革命者而言,死亡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局,是一种必然的归宿。只不过这绝非一种平平常常的死亡,而是一种自愿接受的死亡,一种对抗人生荒诞性的死亡。值得注意的是,马尔罗的人物宁肯选择死亡也不甘忍受受奴役和遭苦难这种荒诞的存在。因为死亡成了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有效手段。

《征服者》中的另一典型人物就是恐怖分子头目洪。他的青少年时期是在中国大城市的社会底层中度过的。在他所处的恶劣环境里,他亲眼目睹了他周围许多人饿死,无数老弱病残者在痛苦中挣扎,在为弄到一份糊口的口粮操劳。痛苦的经历和民不聊生的惨状使他自童年时期就厌恶强者和富人,憎恨理想主义者,并发誓既不希望作强者,也不希望当富人;他恨富人不是因为他们生活幸福,而是因为他们妄自尊大。正是“他对妄自尊大的厌恶”把他“引入了革命行列”。按照洪的观点,“只有服务于恨的行动才既不是撒谎,也不是懦弱,也不是软弱”。如加林所说,正“是这种行动的需要使他成了我们的同盟者;但他觉得第三国际的行动过于缓慢,宽容的人太多”。^[1](p180)当第三国际的代表博罗迪纳说“革命,这就是拿钱养军队”时,洪顶撞他说:“在你们那儿没有正义了吗?”又说“我对政治不感兴趣”。^[1](p182)小说中加林对洪的这种态度十分赞同,因为洪参加大罢工的动机和目的同加林别无二致,也因为洪对于人类生存的荒诞性同加林一样有深刻的理解。洪把“他的生活视为还精力充沛,但毫无希望的肺病患者的生活”。^[1](p180)但他热衷于个人冒险活动,广播电台不时发布以他为首的恐怖集团进行暗杀恐怖活动的消息。他甚至“残忍地屠杀过中国小孩”。^[1](p171)他和其他力图通过行动来摆脱荒诞的人们之间缺乏相互沟通和交流,彼此的看法难以达到完全一致,感情难以融洽。结果,一方面,在革命斗争的方法上,他站在革命伙伴的对立面;另一方面,在情感上又与革命群众格格不入。作为小说中的重要人物的洪也更加算不上是真正的中国革命者,他在小说中的存在,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进一步阐明了通过行动这一对抗荒诞性的有效途径,特别是通过“非凡的冒险,壮烈的革命”这种最有力的行动来否定、战胜荒诞性的马尔罗哲理的核心论点。

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征服者》中的人物完全是作者为了再现其荒诞哲理而虚构的,可想而知,一群满脑子荒诞意识的人物在中国大革命氛围下的活动是不可能具备中国革命特色的,是不可能表明马尔罗在歌颂中国革命的。

继《征服者》之后5年发表的《人的状况》完全“符合马尔罗撰写现代小说的想法”,它是一部更为完满地再现荒诞哲理的杰作。该小说于出版当年就荣获法国龚古尔文学大奖。

《人的状况》以上海和汉口为背景,描写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工人起义的全过程:在北伐军节节胜利

的形势下,上海工人纠察队发动了总罢工,但蒋介石同大资本家和帝国主义勾结,勒令工人纠察队和起义者交出武器,由于第三国际代表的妥协,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对共产党人进行了血腥屠杀,制造了惨绝人寰的重大事件。

《人的状况》体现了马尔罗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寄予的同情和支持,说明马尔罗对1927年蒋介石血腥屠杀共产党人这一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有十分正确的认识,这些都是无须争议的。但同《征服者》一样,马尔罗写《人的状况》的创作动机并不在于描写中国革命,而在于表现“他存之于心的一种图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哲理、一种人生观与人生态度”^[5]。因此从主题上看,作为一本以中国革命为题材的小说,《人的状况》就没有涉及任何它应当涉及的有关中国革命的重大理论问题。相反,人生存的荒诞性、人生存的荒诞性给人带来的孤独和痛苦、人为了否定、战胜和摆脱生存荒诞性所采取的对抗行动却构成了《人的状况》的重要主题。

马尔罗在《人的状况》中塑造的人物较之《征服者》更丰满,数量上也多得多,但同《征服者》中的人物一样,1927年3月21日至4月12日这场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的直接领导人、组织者和抛头露面的人也是一群外国人,而作为中国革命中坚力量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读者眼里却只不过是一些模糊的身影。

虽然《人的状况》是以上海和汉口为背景的,但小说人物的具体活动场景全然是有浓厚异国风情的场所,即上海或汉口的洋人豪华饭店、西式酒吧、外商商行、外国轮船,等等。小说留给读者的印象是一群外国人,活跃在洋化了的中国土地上,领导着中国革命,甚至主宰着中国的命运。

基于对人生存的荒诞性的认识,在马尔罗的笔下,人生活在荒诞的社会里,人面对荒诞的世界所忍受的一切人生的痛苦、孤独、忧虑、恐惧和可悲的命运本身就是荒诞性的具体表现,人想摆脱这些荒诞世界带给人类的痛苦、孤独、忧虑、恐惧的折磨、想逃避已注定不能更改的可悲命运本身也是荒诞的。在《人的状况》中,这种荒诞性表现比比皆是。可以说,小说中的人物几乎无一例外地忍受着现代人的痛苦、孤独、忧虑、恐惧和可悲的命运,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这种荒诞性表现的戏弄。这种人与社会的不协调和冲突是强烈的。

正像马尔罗写道:“如同刚才与陈在一起时一样,他(指吉约)感到就是今天晚上,在全中国,在从欧洲西部直到中部,许多人同他一样,在忍受苦鞭和屠杀同胞之间踌躇,因同样的痛苦而心碎。”^[6]这充分展示了在这个荒诞的世界上,从亚洲到欧洲不同肤色的现代人共同的痛苦和焦虑,这些痛苦和焦虑“像魔影一样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心上”。以革命者形象出现的主人公吉约的痛苦是多重性的,他既忍受着“在忍受苦鞭和屠杀同胞之间”作出选择的痛苦,也忍受着来自血统方面的痛苦,他遭受白人,尤其是白种女人的鄙视,他对着镜子里自己的影子说:“要是我不是混血儿的话……”^[6](p42)他还忍受着同妻子梅悲剧式地过着

古怪的爱情生活所造成的痛苦。吉约是自由(包括性自由)的捍卫者,但他对梅的性自由不无嫉妒。梅仅仅认识而已的一个名叫朗仑的老同学做爱后公然亲口告诉丈夫说:“今天下午我同朗仑睡过觉。”^[6](p41)在持性开放观点的梅看来,这是小事一桩,并且她认为同朗仑做爱并不等于被他占有。但这事在吉约心灵上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和创伤,他说:“一切都是这样虚无。”^[6](p41)吉约的这种失落感,正是荒诞世界强加给他的。马尔罗在描写吉约的痛苦时写道:“他回忆起一位朋友,这朋友很爱自己的妻子,眼看她已瘫痪数月、智力衰萎;他仿佛见到梅也这样慢慢地死去,看见他的幸福像灰蒙蒙天空上消失的云一样荒诞地消失。”^[6](p42)在他们夫妻关系紧张时,吉约甚至想以同梅做爱的方式去侮辱她;以不同她告别亲吻来冷落她。正如马尔罗写道:“所有这一切,使吉约忍受着最屈辱的痛苦。”^[6](p42)吉约的报复性行为一方面是其内心痛苦的流露,另一方面也给梅的内心造成了受丈夫鄙视与侮辱的痛苦。在吉约同梅和好,梅又受良心的责备,内疚不已,痛苦得要窒息,“她的脸像一张死人的脸”,像“一副无人情的假面具”。应当说,在吉约和梅的关系上,马尔罗深化了现代人自我造成痛苦的主题,深化了人生存的荒诞性的主题。

同吉约和梅一样,《人的状况》中的其他人物在这个异化了的荒诞世界里都不同程度地感到痛苦和孤独。陈杀了军火商的掳客唐寅塔后,如同坠入了死亡世界,感到极其孤独。在陈带领几个起义者去参加战斗时,马尔罗这样描写了陈与战友们缺乏沟通的内心痛苦和孤独,“他不是他们中的一员。虽然杀过人,虽然他在场。如果他今天会死的话,他会孤独地死去。对他们来说,一切都很明白:他们去夺取面包和尊严,但对他来说,除了有他们有的痛苦,除了他们的共同战斗,他甚至不知道怎么向他们开口。至少他知道,他们之间最紧密的联系是战斗,而且战斗就在眼前。”^[6](p76)马尔罗还进一步通过环境描写来烘托陈内心的孤独与痛苦:“一条狗两下跳过街道,仿佛某种本能预示它正在酝酿着的事情。这街道的忧伤同他的寂寞一样深沉。”^[6](p76)

卡托夫坎坷的经历也是这个荒诞世界给人类造成的痛苦与屈辱的真实写照。他做过5年苦役;在立陶宛战场作了白军的俘虏,受尽了凌辱,白军集体枪杀他们时,他虎口余生。这一惊心动魄的经历深深刻在他心里,令他永远也忘不了自己蒙受的奇耻大辱。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反映监狱里人的可怕生存状况那一幕幕惨绝人寰的现实:那一大片拥挤在一起的模糊身影,那经受拷打时的一声声惨叫,那种令人窒息的孤独,那一个接一个地被拉去扔进火车锅炉活活烧死的惨状,那些躺在地上等待受火刑者的恐惧……监狱中各种肤色的外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经历的孤独、痛苦、恐惧,他们遭受的凌辱、伤害,充分揭示了人类共同的荒诞而可悲的状况。马尔罗有意识地塑造了一个由不同肤色、国籍和信仰的人组成的有代表性的群体,在20年代上海这个有典型意义的恶劣环境中的活动来反映人的状况的荒诞性,展示人对抗生存

的荒诞性,阐述其荒诞哲理。

马尔罗接受帕斯卡尔的悲观哲学的影响,在《人的状况》中成功地阐述了人生存的荒诞性,把一个荒诞的世界呈现在读者眼前。但是,马尔罗并没有让他们的人物面对荒诞世界悲观失望,而是让他们不同程度地感受到了自己所处的这种任人支配、凌辱、宰割的异化状态,也不同程度地认识到人生存的意义,从而按照自己对人生的不同理解,以各不相同的方式去对抗世界的荒诞性。这是荒诞哲理较之帕斯卡尔的悲观哲学所有的进步。这也是《人的状况》在再现荒诞哲理方面较之马尔罗的其他作品更为成功的方面之一。下面让我们看看《人的状况》中的主要人物是如何采取行动去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

吉索尔说:“很少有人能够忍受,我(吉索尔)怎么说呢?人的状况。”^[6](p191)“我父亲认为,”吉约慢条斯理地说,“人的本质就是焦虑,对自己命运的意识,一切恐惧都由此而生,甚至对死亡的恐惧……但鸦片能摆脱这些,这就是其意义”。吉索尔就是靠“鸦片和沉思”来解脱生存的荒诞性给自己造成的焦虑和痛苦,来解除自己对命运的恐惧的。

科拉比克有否定生存的谎语病,他“玩世不恭,游戏人间”,看重金钱。他“幻想生活却不力图把握生活”。^[6]他帮助吉约提取军火,把警察头子科宁告诉他的消息转告吉约,都极力勒索钱财。

费拉尔认为,“人的欲望就是强制别人”,要摆脱人的状况,就得有无限的权力。他生存的意义就是狂热地追逐权位和占有女人。但费拉尔的粗暴摆脱不了爱情的怨恨和对舆论的恐惧。

作为革命继承者的女主人公梅,把自由性爱作为摆脱人的状况的方式,错误地理解和利用丈夫对她的自由的尊重,同她仅仅认得而已的一个老同学发生了肉体关系。结果适得其反,给她自己和丈夫造成了雪上加霜的痛苦。

赫麦利奇认为,“最最痛苦的是处于陪伴着自己的孤独中。把它讲出来就解脱了”。^[6](p176-177)他从欧洲来到中国,渴望摆脱其痛苦不堪的处境,结果令他非常失望。马尔罗再次影射欧洲人的状况也同样糟糕。

卡托夫顽强地对抗人的状况,对抗世界的荒诞性,投身中国革命。他看重人的尊严,为了让两个中国青年免受火刑,他把自己那份氰化钾给了他们,自己去忍受被活活烧死的痛苦。但他决心在被烧死之前,要掐死一个看守,以抗拒被动地让人烧死的命运,从而赋予其生存的意义。

陈应当说是小说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革命者。父母被杀害以后他成了孤儿。他舅舅又被抓去当人质,并因交不起赎金而被枪决。这样,24岁的陈在那个荒诞的世界上既无钱,又无有价值的文凭。为了生存,他做过卡车司机,当过化学家的助手。这种境况促使他采取政治行动,他渴望一个与那个世界不同的世界的诞生,希望能吃饱肚子,能报仇雪恨,能如愿以偿。他的政治行动赋予了他的孤独以意义。参加罢工和起义后,他逐渐认识到了人生存的意义。孙问陈:“你

想使恐怖主义成为一种宗教?”陈回答道:“不是宗教。是生存的意义,是……是完全拥有自我。”^[6](p156)他说过,“要尽可能高尚地死。”客观地说,陈是一个勇敢、富于正义感的人,可惜他过于冲动,甚至动辄拿生命去当赌注。他说:“人始终会感到恐怖”,“幸亏人可以行动”。^[6](p128)他杀死了唐演塔后感到非常孤独时去见吉索尔,从交谈中,吉索尔发现:“在突击队里行动已经满足不了年轻人,恐怖主义对他形成了诱惑力。”^[6](p51)吉索尔认为陈“陷入了凶杀世界再也不能自拔,他闯入了恐怖主义的生活之中,像闯入了监狱一样”。^[6](p52)尽管如此,笔者认为完全否定陈的行动或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他定为“恐怖分子”都是不公道的,陈同《征服者》中的洪是不一样的。陈采取恐怖行动,是因为蒋介石“不尊重人的尊严,就成了侮辱,受侮辱反过来就激起恐怖主义”。人们不应当忘记,陈为了帮助卡托夫和吉约弄到罢工和起义所需的枪支弹药,毅然杀了唐演塔,获得了提货单,让党组织有了同蒋介石斗争的武器;他在起义的战斗中表现英勇,冲锋在前,主动到最危险的地方参加战斗;在蒋介石屠杀起义者时,他对吉约说过,不管莫斯科同意与否,他都要暗杀蒋介石,他认为不杀蒋介石革命就没有出路,他说,“其他成千上万的苦力就只有靠蒋介石死才能活命”,他同孙和佩怀揣炸弹一起去炸蒋介石未成功时,便一气之下,抓起一块碎玻璃扎进自己的腿,下决心独自一人再次去杀蒋,终因杀蒋未遂又无法逃脱的情况下而自杀身亡。陈的自杀也不能不说是对人的状况的否定,是對抗世界荒诞性的胜利。

至于吉约,他“经过深思熟虑,严肃地选择了行动,如同其他人选择了当兵或做海员一样;他离开了他父亲,为了组织工会,在广州、天津经历过打小工、做苦力的生活”。^[6](p55)对吉约来说,他知道他生存的意义在于使这些被慢性鼠疫般的饥饿折磨死的每一个人赢得自己的尊严。吉约认为:“对于一个每天工作12小时,却不知道为什么而工作的人,不可能有尊严,不可能有真实的生活。”^[6](p57)在马尔罗的笔下,吉约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在北伐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他积极组织罢工、发动起义;当蒋介石和大资本家同以费拉尔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勾结,勒令起义者交出武器,而以博浩迪纳为首的第三国际却持妥协态度时,他同起义者们仍然团结一致,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被捕入狱后,警察头子科宁提审吉约时有如下一段对话:

“你要活命吗?”

“这要看怎样活法。”

“人也可以有不同的死法。”

“我没有选择的余地。”

“你以人总可以选择自己的活法?”

为了不激怒科宁,吉约答道:“我不知道。”

“有人告诉我,你是什么……有尊严的共产党。这可是真的?”

“这确实使你感兴趣?”

“比你想象的要强。”

“我认为对那些同我一起战斗的人,共产主义能使他们有尊严。”

“你把什么叫做尊严?这毫无意思。”

“屈辱的反义词。”

“武器藏在什么地方?”

最后,科宁要吉约供出藏武器的地方后可以放他,也遭到吉约的断然拒绝。^[6](p244)从上述对话可以看出吉约的确是一个自觉的、坚定的革命者。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马尔罗描写吉约在监狱里面对看守的卑劣和囚徒们的惨状时的感想进一步得到证实。“看守的卑劣,与神话中的情形如此一样,使他完全不觉得这是现实;同时,他觉得这种卑劣似乎是一种邪恶的命运,好像权力足以使任何人变成牲畜。这些麇集在栅栏后的模糊生命,如同他童年时梦见过的那些甲壳动物和巨大的昆虫一样令人不安,他们也并不是比牲畜要强的人。他们极其孤独,万分屈辱。”^[6](p239)这实际上就是荒诞哲理的再现,这是悲剧性人的状况活生生的写照。正是这个荒诞的世界使人蒙受了极大的屈辱和奴役,正是这个荒诞的世界使人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做人的尊严。眼看起义者们一个接一个地被拉去烧死,他决定不这样被动地死去。他认为,“死亡是被动的,自杀才算得上自己的行动”,于是服下随身携带的氰化钾,壮烈牺牲,从而以自己的行动来对抗世界的荒诞性,战胜世界的荒诞性,排解痛苦、孤独、焦虑和恐惧,摆脱任人摆布、侮辱、奴役和宰割的境遇。

在马尔罗的人物看来,最好的行动方式是以主动的死或自杀行动来对抗、否定、战胜世界的荒诞性,来摆脱人的可悲状况。

综上所述,马尔罗通过《征服者》和《人的状况》这两部以中国革命为背竟的杰作,成功地达到了其创作动机,再现了其荒诞哲理。

参考文献:

- [1] ANDRE MALRAUX. Les Conquérants [M]. Bernard Grasset, 1928.
- [2] 龚毓秀.《局外人》的主题思想和艺术特色[J]. 文学知识, 1985, (3): 14.
- [3] 柳鸣九, 罗新璋. 马尔罗研究 [C]. 桂林: 漓江出版社, 1984.
- [4] 柳鸣九. 二十世纪文学中的荒诞 [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8.
- [5] 柳鸣九.《中国革命与荒诞哲理》——对《人的状况》基本内容的说明 [J]. 当代外国文学, 1989, (2): 159.
- [6] ANDRE MALRAUX. La condition humaine [M]. Librairie Gallimard, 1946.
- [7] JEAN-PIERRE DE BEAUMARCHAIS, DANIEL COUTY. Dictionnaire Grandes Oeuvres de la littérature fran? aise [M]. Larousse-Bordas, 1997.
- [8] 莫洛亚. 从普鲁斯特到萨特 [M]. 袁树人译. 桂林: 漓江出版社, 1987.